

五四时期江西自治运动初探

林 颂 华

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上曾经掀起过一场规模很大的自治运动。参加自治运动的政治势力比较复杂,其目的各异,因此性质和作用也不同。一般说,鼓吹“自治”或“联省自治”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地方军阀政客,他们借此来对抗中央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一种是资产阶级,他们企图通过自治、联治和制定省宪,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许多省区,两种势力常常混合在一起,难以分辨。而江西由于不存在地方军阀势力,开展自治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资产阶级。在运动中,江西资产阶级积极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统治、争取民主宪政的斗争,其进步作用是应该肯定的。史学界对这段历史尚无论述,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江西自治运动的发展情况及其作用和影响作一初步探讨。

(一)

江西是响应和参加自治运动较早的一个省份。1920年下半年,自治运动兴起后不久,江西旅居北京的绅商士人,为谋求地方自治,便组织起江西旅京同乡会。该会以“赣人治赣”为宗旨,积极投入了当时在全国刚刚兴起的自治运动。1920年10月,湖北、江苏两省在北京发起组织各省自治联合会,江西旅京同乡会立即推举万兆芝、徐宝璜等八人前往报到,使江西成为最先参加各省自治联合会的成员之一。1920年11月,上海成立14省自治同志会,江西又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江西资产阶级争取本省自治权的斗争,是从1920年11月下旬开始的。11月21日,江西旅京同乡会推举魏斯灵、万兆芝等八人前往北京政府请愿,提出了罢免江西省长戚扬,并拒绝反动官僚丁乃扬继任的要求。戚扬是北京政府在江西的代理人,自1913年担任江西省长以来,即联结军阀,任用私党,扰乱财政,庇护劣迹,给江西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要实现赣省自治,必须首先驱逐这个反动官僚。丁乃扬曾供职江西,但他在任期间,搜括民财,劣迹彰彰,早已声名狼籍,为江西民众所痛恨。要争取江西宪政,也不能让丁乃扬再染指江西。因此,在争取民主自治的斗争中,江西资产阶级首先把矛头指向戚扬和丁乃扬。

继江西旅京同乡会请愿之后,江西旅沪同乡会、上海赣事商榷会,以及旅居外省的其他团体和个人,纷纷发表通电或举行集会,要求驱戚拒丁,实现自治。如当时上海赣事商榷会就打电话给北京大总统和国务总理,表示:“吾赣若戚苛政,已逾七年,兹闻中央有免戚之说,使垂毙之民,顿感有苏复之望。但又闻将以丁乃扬继任,命之继戚,无异去命进狼,赣民虽儒,誓不承认。”^①当时赣籍国会议员郭同也发表电文,表示:“仆以为今日治标之计,宜速劾去戚扬,治本之法速定省宪法,以法律强固省地位,以法律排除外力之障碍。”^②这样,江西自治运动就首先由旅居外省的江西绅商士人发动掀起了。

在他们的推动和影响下，江西省内的绅商士人也开始冲破反动当局的束缚和压迫，积极行动起来。第二届江西省议会是省内自治运动的中坚力量。1920年12月初，省议会议员邱玉麟拟就了一份江西自治法草案，交省议会临时会讨论通过。12月中旬，省议会自治委员会就该项议案多次召开讨论会，议定江西省自治法草案应包括总纲、人民、省议会、省公署、省参事等八个部份。这些情况表明，资产阶级已经着手规划本省的自治纲领。结合当时江西的实际情况，省议会还于1920年12月10日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弹劾戚扬和赣人长赣、民选省长两项重要议案。这两项议案集中反映了江西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同月22日，各县旅省同乡会也召开会议，讨论自治进行办法。到1920年底，江西自治运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声势。

这时，全国的自治运动已形成比较可观的局面。被称之为自治运动模范省的湖南，已经在召开制宪会议，起草省宪。浙江省也在积极酝酿制定本省宪法。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等省都在以各种方式运动自治。各地自治团体不断涌现，许多群众组织也纷纷提出自治要求。这一切汇成一股强大的反封建的民主潮流，猛烈地冲击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同时也有力地声援了江西的自治运动。当时，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等团体就纷纷发来电报，对江西的自治运动表示“不胜欣慰、誓为后盾。”

在自治运动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应江西绅商士人的要求，于1921年2月21日，命令免去戚扬江西省长的职务。在此之前，丁乃扬也因为江西民众的强烈反对，畏惧上任，主动请求北京政府从缓任命他为江西省长。至此，江西资产阶级赢得了驱戚拒丁斗争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北洋军阀在江西的反动统治，为刷新江西政治，实现民主自治创造了条件。同时，这一胜利，还在全国人民面前，显示了江西民众的力量，激励了他们的斗志。

撤免戚扬后，北京政府曾任命赵从蕃为江西省长。赵系江西南丰人，时任浙江盐运使。因其从政尚无劣迹，江西绅商士人对他出任表示欢迎，并准备通过赣贤长赣这一策略，进而实现赣省的民主自治。

然而，江西资产阶级争取民主自治的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动督军陈光远的阻挠和破坏。陈光远原是北洋军第12师师长，袁世凯死后，归附直系。1917年8月，他被冯国璋调任江西督军。陈光远到任后，把江西作为自己独占的地盘，苦心经营。江西资产阶级发起自治运动之后，陈光远十分担心这股民主力量会动摇他在江西的统治地位，于是，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起初，陈光远在省城组织所谓官绅俱乐部，拉拢收买各界领袖人物，以瓦解江西绅商士人的斗争意志。待江西省议会通过弹劾戚扬和民选省长两项议案，公开提出自治要求之后，陈光远便开始实行高压政策。在省议会通过前两项议案的第二天，陈光远即召开军政界大会，公开宣布：“江西是中国省份，当然要服从中央，断不能像那独立省份，可以独立处置。以后如有非法行为，无论何人，责成戒严司令警备处审检两厅会同办理”。^③这样，陈光远已经准备用武力来对付资产阶级。至北京政府发布免去戚扬职务，并由赵从蕃继任江西省长命令之后，陈光远便指使其部下对赵从蕃实行严厉“挡驾”，致使赵从蕃抵达九江而不能进入南昌就职，最后被迫称病辞职。与此同时，陈光远又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使之改任自己的亲信杨庆鉴署理江西省长。

杨庆鉴的上台，破坏了“赣人治赣”的计划，使刚刚争来的一线自治希望陷于破灭。为此，江西的绅商士人又开展了激烈地驱杨运动。在这场新的斗争中，江西旅京赣社表现得

最为出色。当时他们在北京联络各界同人，举行集会、示威、请愿，并向有关团体和个人发去电报，表示坚决反对杨庆鉴做江西省长，并敦促赵从蕃迅速到任。驱杨运动对陈光远，杨庆鉴在江西的统治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和揭露。

当然，在陈光远的刺刀保护下，杨庆鉴最终还是登上了江西省长的宝座。此后，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并操纵了第三届江西省议会的选举，以继续抵制和破坏江西自治运动的进行。

从驱威拒丁斗争到驱杨运动的开展，江西资产阶级走完了自治运动的第一段里程。在前进的道路上，虽然荆棘遍布，障碍重重，但向往民主的江西资产阶级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他们正在寻找新的机会，争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二）

1921年4月，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举行北伐。北伐军宣布：光复江西后，将赞助江西民众实现自治。这一消息，给处在困境中的江西资产阶级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使江西自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的斗争中，江西资产阶级公开打出了打倒陈光远的旗帜。1921年8月，旅京赣人多次举行集会，推举代表到府院请愿，要求政府罢免陈光远，否则将协同北伐军实行自动驱陈。1921年9月6日，江西旅沪学生会通电宣布陈光远的十罪状，号召人民起而讨伐。鉴于新产生的第三届江西省议会已成为陈光远、杨庆鉴的御用工具，江西的绅商士人纷纷发表声明，否认它的合法性。在反对陈光远的专制独裁统治、争取民主宪政的斗争中，第二届省议会议员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届省议会自1920年底领导了江西省内的自治运动后，即被陈光远暴力压迫，不得已宣告休会。以后部分议员转到上海，在上海成立旅沪赣民自治促进会，继续领导江西的自治运动。1921年9月中旬，旅沪赣民自治促进会发表宣言，郑重声明：“同人所促进之自治，在打破集权之迷变，戡除武人”之焰。欲领共和政治之真谛，树立全民政治之基础，则选举省县政务官罢免省县政务官之权，必完全属诸人民”。^④这个声明集中反映了江西资产阶级开展自治运动的愿望和要求，这就是要反对封建军阀专制，争取民主自由权利，实现共和政治。这在封建军阀统治时期是有非常鲜明的进步意义的。

北伐军对江西的进攻，推动了江西自治运动的进行。江西民众也以满腔的热情积极援助北伐军。首先，江西民众对北伐军攻赣表示热忱地欢迎和拥护。1921年9月7日，江西旅沪学生会打电报给北伐军主将李烈钧，要求其“赫然整旅，以援梓里”。1921年12月17日，江西旅京同乡会召开特别大会，电请李烈钧归来。第三届江西省议会的一些正直议员也推举议长龙钦海和议员王镇寰，代表江西三千万民众欢迎义师返赣。

其次，江西资产阶级还从人力、物力上给北伐军以大力支持。1922年3月，江西安福县教育会发表通告，呼吁全省绅商慷慨解囊，资助北伐军，得到全省绅商的热烈响应。同月，广东韶关大本营特别参谋孙绍康到湖南衡阳筹餉，旅居湘省的赣民一次就为他筹集十万余元。同年5月，日本航空学校毕业的赣籍航空生喻士英等十几人也“联络同志，不惜重资，亲向英国购置飞机一架，已由某洋行空运至独山交界处，以资西南军攻赣之用”。

⑤当北伐军从南雄入赣，向赣南发起进攻时，江西的绅商士人还给北伐军以热情帮助。据韶关大本营幕僚处报导：“赣省人民对我军极表情好，沿途多以茶水、饭粥等供给。于运输谍报上，亦多援助。我军前进时，人民多指示进路，并有以敌军机关炮、及炮兵阵地示我，因

“守其言”。

在江西民众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北伐军进展迅速，加上当时赣西镇守使方本仁宣告独立，与北伐军协同作战，使得陈光远的军队兵败如山倒、陷于全面崩溃。1922年6月中旬，北伐军收复赣南之属17县，取得进攻江西的重大胜利。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陈光远兵败辞职，只身离开江西，到天津经商。

在北伐军进攻江西的新形势下，第三届江西省议会也开始摆脱陈光远的控制，与全省人民一道争取民主自治。1922年4月，第三届江西省议会讨论并通过了《赣省议会之县自治案》。该议案提出在实现省自治之前，先实行县、市自治，并在“每一道区先行试办一县，为县长民选之先声”。^① 议案还规定：“县设县民大会，以县属各市乡民大会选出之代表组织之，县民大会有选举县长之权。县民大会，认县长为违法或失职时，于县民大会30人以上提议，得到会代表过半数之投票罢免之”。^② 这些规定使县级政权处在间接民权的监督之下。“间接民权”虽然还属于民主政治的较低层次，但它与封建专制体制相比，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根据这项议案，人民群众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选举、罢免县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民治理国家的权力。这就否定了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十分重大的进步意义。因此，《赣省议会之县自治案》一经公布，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和拥护。

随着北伐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江西自治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陈光远败逃江西的当天，旅沪赣民孙镜亚即草拟了一份《江西民治计划提议案》，提出了赣贤长赣，民选县长，以及由民选代表组成省民建设会议，以制定省宪等主张。这项提案受到省内外人士的极大关注。转移到上海的第二届省议会议员也在抓紧组建江西省自治政府。1922年6月中旬，旅沪赣民自治促进会讨论通过了《江西省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决定迅速组织江西自治政府，省长由省公民会选举，省务院实行合议制。该大纲与辛亥革命时各省临时约法性质相同，其内容与湖南、浙江两省宪法比较接近，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政治色彩。北伐军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以后，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诺言，赞助江西绅商士人建立自治政权。1922年6月6日，李烈钧从前线发来电报，嘱咐在沪的第二届江西省议员“迅速将省政府组织大纲，予拟妥洽，以备施行。”^③ 在北伐军的大力支持下，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体制即将诞生，这对江西的绅商士人来说，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时刻！

然而，就在江西资产阶级加紧筹建自治政府时，北京政府任命蔡成勋为援赣总司令，率其所部第一师以及河南暂编第一师常德盛部增援江西。这些部队的开进，重新稳定和加强了北洋军阀在江西的反动统治。这时，广东革命政府内部也发生了陈炯明的叛乱。1922年6月下旬，李烈钧奉命“回师靖难”，北伐军全部退出江西。江西资产阶级因此失去了坚强后盾，这使刚刚可能实现的自治又一次陷于夭折。

（三）

从蔡成勋准备入赣的那天起，江西资产阶级就开展了猛烈的拒蔡运动。1922年6月以来，江西旅京同乡会、江西旅京学生自治促进会、欧美同学会、江西旅京赣社、江西旅沪同乡会、旅沪赣民自治促进会、南昌商会、南昌银行公会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强烈反对蔡、常军队入赣。并要求总统黎元洪恪守“鱼电”，撤回援赣军。

然而，资产阶级的呼号抗争，终究敌不过封建军阀的武力。不久，蔡成勋便率部开进江

西。蔡成勋入赣后，步陈光远后尘，企图把江西变成他的独立王国。他一方面用武力胁迫孙中山同意的新任江西省长谢远涵赴任，另一方面积极运动曹锟、吴佩孚保举他为江西督军。蔡成勋是曹锟的把兄弟，与曹、吴关系密切，自然如愿以偿。1922年9月3日，北京政府果然任命蔡成勋为江西军务督理（此后各省督军也改称督理）。贪婪的蔡成勋还嫌不够，又阴谋自兼省长。他一面以高官厚禄收买拉拢省内各团体领袖和各巨绅为其歌功颂德，一面又再次派人掣巨金去保定、洛阳，请曹锟、吴佩孚保举他兼理江西省长。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蔡成勋这种集江西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企图终未得逞。以后，蔡成勋又支持其亲信李廷玉攫取了江西省长职务，从而使江西重新成为北洋军阀的一统天下。

蔡成勋倚仗武力，在江西建立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行径，激起了江西民众的极大义愤。为此，资产阶级开展了更为剧烈的拒蔡斗争。1922年7月16日，旅沪赣民自治促进会电请在京的赣籍国会议员，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并呼吁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及裁兵促进会，声援赣人自治。7月底，省内激进派人士议决组织暗杀团，以铲除蔡成勋及其帮凶。8月17日，旅京江西同乡会联合赣籍国会议员、省商会、省教育会、省农会及各团体代表二百余人，到国务院请愿，迫使内阁会议通过查撤蔡成勋案（后来被曹锟阻挠搁置）。同日，北京政府参议院召开宪政审议会，全体赣籍国会议员响应本省拒蔡运动，拒绝参加此会。致使该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产。8月18日，又有100多名赣民手持旗帜，攀阻内阁总理王宠惠的汽车，要求政府迅速查办蔡成勋。9月3日，江西旅京各团体在北京组织驱蔡临时委员会，动员江西各界人士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以抵制蔡成勋。9月17日，江西省各公团领袖响应驱蔡临时委员会的号召，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责令李廷玉交出省长印信，否则将发动全省民众举行“三罢”斗争。同日下午四时，南昌市洗马池一带商民果然开始罢市。晚上9时，省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9月18日起实行全省总罢市。次日，南昌市洗马池、杨家厂、翠花街等繁华市区果然响应省总商会号召，举行罢市。同时，南浔铁路工人也举行了全体总罢工，南昌市内电灯、电话工人也一律切断电线，投入罢工斗争。整个南昌处在与蔡成勋、李廷玉反动军阀的尖锐斗争中。在轰轰烈烈的拒蔡斗争中，省内青年学生更是冲锋在前，他们从1922年8月开始就组织起了一支庞大的学生自治军，直接参加北伐军对北洋军队的作战。

江西民众如此剧烈的拒蔡运动，给蔡成勋、李廷玉以沉重的打击。在群情激愤，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李廷玉不得不交出省长印信，并于9月26日逃出了南昌城。

在这一阶段以拒蔡斗争为中心的自治运动中，江西资产阶级表现出了坚决的反封建的斗争精神。他们的斗争已经超出了一般和平请愿示威的范围，而且发展到了组织民众与反动当局展开面对面斗争的阶段。正是在他们的号召和率领下，江西的绅商士人，乃至一般的工人、学生都积极投身于这场反封建斗争的行列，最终挫败了蔡成勋自兼省长的阴谋，并迫使李廷玉交出省长印信，使北洋军阀在江西的统治再一次受到猛烈的冲击。江西自治运动的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在五四运动之后，由于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不够发展壮大，资产阶级仍然可以在一定场合和一定时间内担负反封建斗争的领导职责。

当然，在军阀专政、武人当道的时代，资产阶级终究不是封建军阀的对手。李廷玉虽然被撵下了台，但蔡成勋在曹锟、吴佩孚的庇护和支持下，继续奴役和压迫江西人民。据史料记载，出现在南昌的这次罢市罢工斗争，很快就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武力镇压。罢市的当

天，蔡成勋即派出“如狼似虎之军队，枪刃耀目，往洗马池各处店铺敲门，勒逼开市。商人无武器抵抗，只得俯首听命”。^[1]在封建军阀的武力压迫下，江西自治运动又一次沉沦，最后不了了之。事实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 ※ ※ ※

总观1920—1922年间的江西自治运动，其发展水平与湖南、浙江等省的自治运动还有相当差距。当时湘、浙等省的自治运动已经发展到制定省宪、实现自治的水平，而江西还处在创造条件、筹备规划的阶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江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落后，资产阶级力量弱小。据记载：“1900年以前，江西仅有近代工业10家，其中外国资本占6家，官办和商办各占2家。在1900年——1918年的18年间，江西拥有近代企业200余家，而其中绝大部分都为外国资本和地方官僚买办所控制，民族资本所占的比重很小。”^②江西近代工业的这种状况，使得江西民族资产阶级还未能形成一种较强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是由于江西自治运动未能与地方实力派相结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江西革命党人李烈钧曾经策动新军在江西宣布独立。李烈钧担任江西都督以后，大力经营江西，力量得到很大发展。但在“二次革命”后李烈钧反袁失败，亡命日本，江西就一直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到自治运动发生时，江西已经经历了李纯、陈光远两任北洋军阀的统治，革命党在江西的势力被摧残殆尽。这种政治形势使江西资产阶级在开展自治运动时，不可能得到国民党及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诚然，江西自治运动的第二个阶段，曾得到以李烈钧为首的广东北伐军的支持，但他们不久就撤离了，这就使江西自治运动未能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然而，尽管江西自治运动还处在一个较底的发展阶段，但作为一次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和影响。第一：江西自治运动表现出了鲜明的反封建性质，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树起了反封建的战旗。如前所述，江西自治运动虽然历经艰难坎坷，但是江西资产阶级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与封建军阀作斗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担负起了领导江西人民与封建军阀作斗争的重要责任。第二：江西自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限制和削弱了它们在江西的统治力量。其中反动官僚戚扬被逐，丁乃扬畏惧上任，封建军阀陈光远败逃，以及李廷玉被迫交出省长印信，都是有利的证明。第三：江西自治运动产生的一系列自治方案和自治宣言，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发了人民群众的觉悟，为人们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接受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所有这些，在当时都是进步的。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进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几年，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党的组织也相对有限。江西在1924年以前，党的活动只是在少数青年学生中开展。而在二十年代初期，资产阶级发动领导的这场自治运动，能够冲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传播民主宪政的新思想。这场运动同中国共产党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其目标和方向是基本一致的。因此，资产阶级的自治运动是有助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

然而，长期以来，在如何评价这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时，人们常常因为它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后，又与当时地方军阀鼓吹的联省自治运动混合在一起，而予彻底否定。但通过上述对江西自治运动的分析，我们看到：由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自治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的。因此，我以为不能简单地以五四运动划线，（下转第104页）

来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在党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就讳言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有“左”的倾向,这也不符合历史实际。问题是党当时没有能力有效地纠正“左”的偏向,使工农运动健康发展。和资产阶级一道指责和压制工农运动,当然是错误的。到了大革命的紧急时期,陈独秀束手无策,不依靠工农积极地发展革命武装,反而把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让了出去,企图以此来稳住武汉国民政府,谁也不能不承认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如果说陈独秀有个“二次革命论”的框框,所以才这样去做,似乎是把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

问:许多论者都把陈独秀成为托派之后的思想,和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思想联系起来,认为陈独秀搞“二次革命论”是一贯以之的。因此,有必要谈谈这个问题。

答:是这样的。人们常常把陈独秀1923年两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摘引下来,再加上陈独秀成了托派后认为中国社会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国民党政府是个资产阶级政府等观点,前后联接起来,那么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就是一贯的了。

陈独秀1923年的两篇文章,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陈独秀成了托派以后则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托洛

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一次革命论”,不是“二次革命论”。陈独秀曾撰文鼓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连革命发展阶段论也否定了。中国托派的斗争目标是两面开弓,一方面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一方面仍继续反对国民党政府。把陈独秀成了托派以后的思想也说成是“二次革命论”,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问:听了你的许多议论,我觉得也不无道理,算是一家之说吧。最后能不能谈谈研究这个“二次革命论”问题究竟有何意义呢?

答:我认为探讨这个问题,对于研究陈独秀这样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历史人物是必须的。要尊重历史事实。如果用“二次革命论”一言以蔽之,是无法深入研究陈独秀复杂的政治思想和理论遗产的。同时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的研究关系也很大。当时是国共合作,又有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国民党内派别纷呈,政治情况异常复杂,党还是在幼年时期,处境也很困难,许多历史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具体的历史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从“二次革命论”的概念出发,然后寻找材料说明这个概念,是不利于深入开展这个时期的历史研究的。

(责任编辑: 汪 忠)

(上接第99页)

凡在此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一概在否定之列。

注:

①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年12月22日。②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2月15日。③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2月26日。④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9月17日。⑤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5月15日。⑥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6月17日。⑦《申报》1922年4月3日。⑧《申报》1922年4月5日。⑨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6月7日。⑩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9月24日。⑪《江西工运史研究资料》总17期。

(责任编辑: 肖华忠)